

导 论

当代中国文艺创作领域“历史文学”（包括“历史小说”、“历史影视剧”、“历史散文”、“历史诗歌”等）的繁荣增殖和世界范围内批评理论普遍的“历史转向”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崛起，都将“历史诗学”问题推到了文艺理论批评的前台。但理论批评界尚未对这些概念及其间关系做出具体甄别和明确界定，也未能对它们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致使理论批评在这些问题上“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这一文艺现实迫切要求“历史诗学”对之做出系统的解释和说明，也促使“历史诗学”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和改造更新。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文艺发展的现实已经无法用已有的“历史诗学”理论做出解释和说明，而“历史诗学”的一般难题又以某种特殊形式体现在当代文艺实践之中。这就要求我们既将当代文艺实践放在“历史诗学”视野下进行审视，也将“历史诗学”本身看成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性的理论存在。基于此，我们认为“新历史主义”是与“历史诗学”结合在一起的，其成败得失关乎“历史诗学难题”的解决，因而必须在“历史诗学”视野下做出说明。

一、选题的研究对象及范围

“历史诗学”（The Poetics of History）涉及文学理论的基本

问题。这个概念至今尚无统一界说。一般说来，它研究文学“关涉、表述”（relate；represent）历史和历史“关涉、表述”文学的问题，即“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联”、“关系”（relation）问题。所谓“关系”，并非两个内涵清晰的既定活动之间的静态关联，而是两个未完成的、彼此渗透和相互界定的活动之间的“动态构成性关联”，这种多重未定的“关联”也参与到对“历史”和“文学”自身本质的定义之中。换言之，“历史”以及“文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一定程度上正是由“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联”和“关系”而得到说明的。^①“历史转向”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都特别强调了这种关联的构成性、动态性、交互性和具体性，这必然导致“历史诗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批评重心的转移和观念方法的更新。

“历史诗学”在构词上包括“历史”与“诗学”两个部分，其含义之不同，主要源于人们对“历史”与“诗学”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历史”可表示“诗学”的研究对象，在此意义上，它指“关于历史的诗学”，即关于历史的“诗性”（poetic）问题的理论，它涉及历史及“历史修撰”在本质上的“转义性”、文本性、创造性、虚构性、审美性以及意识形态性等；“历史”亦可指称研究文学“诗性”问题的学科参照以及立场、观点、方法或“视域”（horizon），在此意义上，它指“以历史为学科参照和原则方法的诗学”，它涉及文学在本质上（包括文学的各种要素

格里芬认为，依据现代观点，人与他人，人与他物的关系是外在的、偶然的、派生的。与此相反，后现代作家把这些关系描述为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constitutive）。“个体与其躯体的关系、他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其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格里芬主编：《后现代精神》，21—2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笔者也从这种“构成性”角度理解“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内在关系”。

和各个层面)的“历史性”以及史学及其方法原则对文学的制约。与之相应,在“历史诗学”的运用上也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取向:史学家多用“历史诗学”指谓以文学及其本质为参照而建构的史学理论;文学理论家则多以“历史诗学”指称以史学及历史原则方法为参照而构设的文学理论。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两种取向都程度不同地关注研究对象的“诗性”和“历史性”内涵,这使两种取向在客观效应上可能趋于一致,这种“趋同性”为“历史转向”以来的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所强化。结构主义以降的大多数理论家,不管是史学家还是文学理论家,都认为“历史”与“文学”在共同的“语言性”和“文本性”基础上具有广泛的通约性,因此都不加区别地用“历史诗学”兼指两种取向。^①这种合取两种取向的“历史诗学”是广义的“历史诗学”。我们也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尽管我们始终关注的是“文学”问题。

基于如上认识,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作为“工作假设”的广义的历史诗学定义:在“历史—文学”的关系语境中,通过揭示历史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的文学性(诗性)结构以及文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历史性含蕴来阐释文学与历史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关于文学本质或历史本质的理论界说,这种学说可称为“历史诗学”。它关注的焦点是历史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关联问题;它呈现出多种形态,具有史学和文学等两个彼此关联、内在统一的取向。

我们认为,当代文学创作领域的“历史文学”和批评领域的

海登·怀特(《元历史·导论:历史诗学》,译文参见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三辑,355—3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又见《后现代历史叙事学》,369—4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汉密尔顿(参见 Paul Hamilton, *Historicism*, pp.7—13, Routledge, 1996)也在此意义上使用“历史诗学”。

“历史转向”以及“新历史主义”，尽管在表现形态上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它们在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上的利弊得失都应该放在“历史诗学”视野下进行批判、分析和说明。

“新历史主义”显示出推进和更新“历史主义”的强烈冲动。“历史主义”是坚持历史语境在各种文本阐释中的头等重要性的批评运动，它是启蒙运动的“伴生物”^①。长期以来，“历史主义”对众多的思想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日益发展为研究包括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在内的人类历史的一种历史哲学方法。近二十多年来，“历史主义”在当代文学批评中正在经历着强劲的变革和“更新”。^②这个“更新”运动，通常自称和被称为“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新”历史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在历史语境中阅读文学的批评方式，它还涉及“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功能”、“知识型转换”、“表述模式和系统”、“话语形成”以及“知识客体的生产”等问题。就连 20 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批评流派——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都最终进行了“历史转向”而“加入了”（当然也“改造着”）这个古老的“历史主义”批评传统。众多“批判历史主义”甚至“反历史主义”（Anti-historicism）批评流派也变成了“新历史主义”的组成部分。理论批评的发展往往存在着“负模仿”^③和“沦为自己揭露对象的牺牲品”^④的“共成模仿”现象，这种现象应该从更积极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众所周知，维柯是“历史主义”的先驱，但他同

^① Claire Colebrook, *New Literary Histories*, p.16,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② Paul Hamilton, *Historicism*, p.2, Routledge, 1996.

^③ 钱钟书：《七缀集》，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④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时又是“反历史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始祖^①。这种现象不但说明了一种思想学说具有解释上的多种可能性（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而且说明，一种学说得之于其对立面的东西通常并不比得之于其同盟者的东西少。就“新历史主义”和“历史诗学”的研究而言，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开放性，将其同时放在历时性演替和共时性关联的广阔的理论批评语境中进行说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诗学”以文学与历史的“关联”为立论基础，可资为新历史主义研究的一个开放性的共时断面和历时线索，它可以让新历史主义在解答历史诗学“根本问题”和“基本问题”时显示出自身的特点。而所谓的“历史转向”，即是对这个“横断面”的进一步“放大”和“扩展”。

因此，我们这里所研究的，是“历史诗学视野下的新历史主义”，也是“新历史主义所力图解决的历史诗学难题”。从“历史诗学视野”看，新历史主义是“历史诗学”的一个特殊形态和独特范式；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历史诗学”是对“新历史主义”问题的概括化和理论化。我们主要以“历史诗学”难题为“经”，以“历史转向”中的批评和创作实践为“纬”，对“新历史主义”展开研究。具体说来，我们试图以“新历史主义”为流派依托和批评个案，以“历史诗学难题”为基本线索和关注焦点，以“历史转向”为当代理论背景和“新历史主义”与其他批评流派相互沟通的中介桥梁，对这三个部分的“交集”部分进行研究。重点是考察新历史主义对历史诗学难题的探索、解决、深化和“问题化”。

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二、选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历史、人、审美和文本是文学活动“球体”的四个内在关联的维度；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审美精神和文本精神是文学活动同根而异株的精神取向；史学、人学、美学和文本学是全方位整体文学研究的必要（未必是充分的）向度；四个向度上分途拓展与内在整合之间的融通互进是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由之路。文学活动中的人，是历史的人和审美的人，也是离不开文本的人；文学活动中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和审美的历史，也是文本性的历史；文学活动中的审美是人的审美和历史的审美，也是文本基础上的审美；文学活动中的文本是人的文本和审美化的文本，也是历史性的文本。^① 在这些相互关联的向度中，“历史（性）”构成了文学活动的“地平线”。“历史”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可以从这个整体格局中引申出来。我们强调这四个向度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但也不否认，文学研究可以分别从这四个不同向度切入而进行纵深开掘，进而主要基于某一向度而建立一种“诗学”理论，故不妨有“人学诗学”、“审美诗学”、“历史诗学”和“文本诗学”等次级文艺学研究学科。这些学科既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也有进一步走向对话交融和内在整合的总体趋势和内在需要。“历史诗学”的理论意义，也可以从这种学科构成的总体格局中显示出来。

“历史”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还可以从文学批评实践的历史发展中得到确证。在中西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历史一直是文学本质问题不可或缺的基本理论参照轴线；历史与文学之间，不论是相互亲和还是彼此疏离，其间“关系”问题历来都是文艺理论的重大课题。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弗莱的《批评的解

参见陆贵山：《宏观文艺学论纲》，第一章，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剖》从“春秋义法”、“文参史笔”的传统到《文史通义》“六经皆史”的断言；从西方人对“史诗”的推崇和对“历史书记员”的渴望，到东方人对“诗史”的赞誉和对“良史之忧”的专注；这一切都证明了历史作为文学根本参照轴线的重要意义。中西古代文化传统倾向于强调历史作为文学楷模的重要性，这造成了文学对历史的“膜拜”和向历史的“趋赴”。近代以来，随着“历史意识”的觉醒和增强，人们的历史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文学理论对文史关系的认识却基本继承了古代传统，仍旧强调历史作为稳定的“背景”和“语境”对于文学阐释的决定意义。历史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甚至通过文学批评对历史的“放逐”而以“否定的”方式显现出来，20世纪以来的各种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即是如此。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批评排拒历史维度，客观上却从语言层面打通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学科界线，以其语言理论为知识范本而使文学成了诸学科的范例，从而引发了史学向文学的趋赴，并将传统历史诗学“线性”翻转过来。当代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真正批评是从其一头“钻进去对它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又“从另一头钻出来的时候，得出一种全然不同的、在理论上较为令人满意的哲学观点”^①。当代理论“钻出来”以后，便进行了广义的“历史转向”，开始强调“历史性”与“文本性”之间的关联和制衡，这在深层次上进一步突出了历史作为文学参照轴线的重要性。这些理论和批评实践既说明了历史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和历史诗学的存在价值，也召唤历史诗学对之进行分析批判和总结吸收。

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在四个向度上分途

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3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拓展有余而内在整合不足；四种诗学之间的“对立”有余而“对话”不够；人学、美学和文本学向度的拓展迅猛而史学向度的深化相对迟缓；史学理论急遽汰变而其在文学研究中的成功运用稍嫌不够。这造成了文学研究的某种“倾斜”和历史诗学的相对“滞后”。这甚至是 20 世纪人文学科普遍的“历史厌倦症”的一部分。^① 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来，新的“科际整合”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总趋势，历史诗学、人学诗学、审美诗学以及文本诗学之间的深层融通也是大势所趋。这要求各不同的“诗学”在各自的层面上，以新的理论方法和开放态度，对“整体诗学”问题做出向心式挖掘和深层横向贯通。这些问题都已经为最近二十多年的理论批评，特别是“历史转向”中的理论批评所重视和强调，但似乎尚且不遑得到扭转和解决。

长期的研究“倾斜”和历史诗学的相对“滞后”，使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学术研究对“历史”的关注取得了“历史转向”（The Turn to History）^② 和“历史回归”（The Return of History）的“美名”。这种“历史转向”至今仍然蒙受着双重的误解：在传统历史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那里，这种转向都引起了惊慌和声讨，间或也有“无知的追随”。但所谓“历史转向”，是建立在“语言论转向”“之后”和“之上”的“转向”，它既不是历史主义的“胜利”，也不是“语言论转向”对历史领域的“占领”。它其实正是传统“历史主义”与“语言论转向”的文本主义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在“历史转向”过程中，“结构”与“历史”之间的历史争端和“形式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古老战场烽烟再起，

① 施密特：《历史与结构》，3页，重庆出版社，1993。

② John Brannigan,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p.19,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不过这一次是发生在“解构主义”与“新历史主义”之间。^① 值得注意，“历史转向”不但将“历史诗学”问题推到了前台，而且使新历史主义成了“转向”过程中的“显学”和争论焦点。有理论家认为，新历史主义是文学批评“‘回归历史’的别名”^②。甚至有人认为“新历史主义面临的问题就是文学理论本身的问题”^③。因此，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对一个流派的“孤立”研究，而必须将它放在历史诗学的宽阔视野和“历史转向”的开放语境里，从文艺学学科重建的高度进行审视和把握。

就中国的情况看，历史诗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历史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史重写（分）运动的展开”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的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贯穿于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的历史书写活动，既是“内生原发的”，也是“外生继起的”，它与国外新历史主义保持着精神气质上的亲缘性和方法策略上的通约性，可以相互阐发和彼此彰显。这种可称之为“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现象，既向中国当代的文艺观念和批评方法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在人民大众中造成了广泛影响。各种“戏说”、“重写”和“解构”历史的大规模历史书写活动，不但为“历史诗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迫切召唤一种新的“历史诗学”来指导。但是，国内文学理论批评中尚未出现在“历史诗学”视野下对这些文艺现象的系统研究。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虽对此问题做出了不乏深度的批判和分析，但大多仅限

Murry Krieger, *The Ideological Imperative*, p. 59, 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3。

② Wilson, R. & Dutton, R. *New Historicism and Renaissance Drama*, p. 1,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2.

③ Claire Colebrook, *New Literary Histories*, p. 234,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于就事论事，缺乏对相关理论的全面、历史的把握。我们力求在“历史诗学”大视野和“历史转向”的大背景上对之做出研究和评析。

三、论文的逻辑展开和结构安排

“历史诗学”问题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新历史主义”是一个跨学科、超国界、多流派的学术群体；“历史转向”是一个涉及众多学术领域的大规模的理论批评运动。我们旨在将这三个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重点考察“新历史主义”对“历史诗学”问题的“深化”和“问题化”。为了实现这一理论目标，本文遵循着分析与综合同时并举的逻辑展开方式，试图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历时与共时相统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补充的方法对论题进行多学科综合治理。

论文共分七个部分。“导论”部分是对论文的对象范围、理论实践意义和结构安排的总体说明。第一章主要考察“历史诗学”、“历史转向”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内涵、本质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该章试图设计和呈现出“历史诗学”的“理论坐标及其问题序列”（包括其“根本问题”和“基本问题”）；勾画和描绘出“历史转向”的“基本特点和历史语境”；勾勒和概括出“新历史主义”的“对象范围和观念方法”。这一部分提出了论文的基本问题，旨在为进一步的讨论奠定基础。

第二章集中考察“历史诗学的形态学和话语范式演替”，这一部分是对第一章中“历史诗学”问题在共时性上的拓展和在历时性上的深化，也是对“历史诗学理论坐标”中“历史”观念“多重性”的进一步讨论。它涉及对于历史诗学的“形态与范式及其划分依据”的说明，根据历史诗学对“历史”不同层面

(“历史的过程”、“历史的认识”以及“历史的叙述”)的侧重而划分出“思辨历史诗学”、“批判历史诗学”和“叙事历史诗学”等三种形态和范式，指出其间既在共时性上同时并存又在历时性上通变沿革的复杂关系。该部分旨在通过对各种历史诗学范式的“释名彰义”和“追根溯源”而呈现出各种历史诗学的基本特点和主要问题，指出“新历史主义”主要处在“叙事历史诗学”的话语范式之内，同时又因为参照了与一般“叙事历史诗学”不同的“语言学”并吸收了其他历史诗学范式的思想成分，因而显示出向“历史”多重开放的特点。

第三章重点考察“新历史主义的对话语境和思想前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分是对第一章所讨论的“历史转向”问题的“放大”和“扩展”，同时也是对“新历史主义”理论资源的考察。它涉及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解释学、文化人类学、解构历史学及巴赫金历史诗学之间的关系。从总的趋势看，这些流派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着“历史”并进行着“广义的”“历史转向”，它们大多倾向于强调“历史”（包括文化）的“复数性”、“异质性”和“具体性”，而历史的这些特点也正是“新历史主义”所全力强调和追求的。当然，这些理论与“新历史主义”之间也都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也作为参照点而使“新历史主义”自身的特色凸显出来。

第四章主要考察“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念系统”，这部分一定程度上是对第一章的“深化”、“细化”和“具体化”，它旨在突出“新历史主义”解答“历史诗学”基本问题时在文学理论的一般问题上所呈现出的特点。它涉及新历史主义在有关“历史性与文学观念”、“历史性与作家主体”、“历史性与文本”、“历史性与读者接受”以及“历史性与文学批评”等问题上的具体观点。该部分显示出，“新历史主义”将“历史性”灌注到了文学活动

的各个要素和各个层面，从而对这些要素和层面做出了独特的“历史化”解释。这突出了新历史主义对“彻底的历史主义”的追求。它在这些问题上的探索既富有成效，也面临着各种难题。

第五章主要考察“新历史主义”作为文艺思潮在新时期中国文艺实践中的表现。我们是将中国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作为国外“新历史主义”的“厚描”意义上的参照系和语境来看待的。前者将“新历史主义”的诸多成就和迷失都“放大”了，并使其“悖论性处境”变得更加具体化和“可视化”。该部分显示，新历史主义的诸多理论批评原则在文艺创作实践中面临难以克服的困境，存在着沉沦于历史碎片、走向小历史相对主义、导致历史不可知论和迷失于意识形态边缘的危险。

“结束语”部分旨在对新历史主义的成败得失做出整体评估和全面审理，也试图对其未来做出“定向”。该部分涉及“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之间内在统一又相互补充的关系以及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总体上的“超越与局限”。它一定程度上是对前五章已经提到的一些问题的进一步概括和综合，同时也是我们基于自己的历史诗学构想而对新历史主义的反思和批判。

总之，尽管新历史主义主要是作为一个强调历史与文学之间相互渗透和制约关系的松散的学术流派存在并发生影响的，但问题却涉及历史诗学的全部领域和难题，因此必须在历史诗学视野下去审视。尽管历史诗学主要关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交涉和关联问题，但其意义却直接关乎文学理论和文学自身的存在，因此必须在文学理论的背景上对它做出批判分析。

第一章

历史诗学、历史转向与 新历史主义

本章主要通过考察“历史诗学”、“历史转向”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说明“历史诗学”的理论坐标和问题序列，呈现“历史转向”的基本特点和历史语境，勾勒“新历史主义”的对象范围和观念方法。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这三个问题是内在关联的。“历史诗学”是考察“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视野；“历史转向”是说明“新历史主义”开放的批评语境；“新历史主义”是对“历史诗学”问题的深化和“问题化”，是对“历史转向”趋势的推进和“具体化”。

第一节 历史诗学及其理论坐标和问题序列

在汉语语境中，“历史诗学”这一术语并不多见，因而是一个有待解释的概念。一般说来，在“历史—文学”的参照语境中，通过揭示历史的本质特征及其“诗性”结构和文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历史性含蕴来阐释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联和相互表述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关于文学本质或史学本质问题的理论界说，这种学说可称为广义的“历史诗学”。

“历史诗学”所指的“历史”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历史学科”、“历史方法”和“历史原则”；尽管每一种“历史诗学”通常在三个维度中有所侧重，但我们所希冀的“历史诗学”应该将这三个维度同时考虑进来。“历史”也包含三个彼此锁联的层面：“历史的过程”、“历史的认识”和“历史的叙述”；尽管各种“历史诗学”通常总是基于其中的某个或某些层面而立论，但我们所期待的“历史诗学”应该将这三个层面同时纳入自己的视野。“诗学”也具有不同的内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主要是研究“诗体文学”的理论，这是狭义的“诗学”。20世纪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扩大了这一概念的范围，使其可以指称一切有关想像性、虚构性文本的理论（如散文诗学、小说诗学等），甚至指一切语言构成物的“共时化空间化的关系系统”^①（如文化诗学、性别诗学等）。同时，结构主义还强调了“诗”的“生产性”（此即“诗”之本义，该词在西方初起时有“技艺”、“生产”之义。“历史诗学”也重视“诗”在历史文化系统中的能动作用）。这即是广义的“诗学”，我们也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值得注意，历史的“三个维度”、“三个层面”与“诗学”的多重含义是深层融合在整体“历史诗学”之中的，它们是“历史诗学”理论上可分而实际上无法分割的构成部分。

“历史诗学”在构词上所包含的“历史”和“诗学”两个部分无法分割，但人们可以将“历史”理解为“诗学”的对象，或者“诗学”的方法原则和“视域”；与之相应的“历史诗学”便具有了两个不同的主要理论目标，我们可以将它区分为“文学的”（旨在说明文学问题）和“史学的”（旨在说明史学问题）等

^① John Brannigan,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p.92,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两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取向。同样，我们所希冀的“历史诗学”应该将这两种取向同时涵摄进来。

“历史诗学”以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为思考对象，考察人类历史活动与文学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表述关系。同时，“历史诗学”也基于“历史性”而对文学活动中历史与人、历史与审美、历史与文本的关系做出系统的说明，因此历史诗学也秉持着一个对各种文学理论学说进行内在整合的理论诉求。职是之故，“历史诗学”问题的澄清密切关涉文学根本问题的解决。

“历史诗学”所涉及的问题对文学研究具有根本意义，因而这些问题很早即为中外理论家所关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文学与历史对勘发明，可以说是一种最宽泛意义上的历史诗学——不仅因为“可能发生的事”与“已发生的事”之间大面积重叠，而且因为他在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语境中考察诗学问题。近代以来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强调历史对文学的制约作用，形成了典型的传统形态的历史诗学；维柯在《新科学》中虽未明确提出“历史诗学”术语，但他将历史与“诗性”联系起来，认为原始的历史是一种“诗性”历史，历史逻辑的“诗性”绝不亚于其“语法”性质。^①维柯已经从“诗性”根底上将历史与文学关联起来了。由维柯等人启导的“历史主义”文学研究方法，更是多方面地开掘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联。赫尔德特别强调了人性和历史文化的多样性，探讨了“艺术与历史的相互植根性”，不但推动了传统历史主义的历史诗学，而且为“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奠定了一个基础——着迷于一种可能性：将特定文化的所有

维柯：《新科学》，379页，商务印书馆，1989。

书写的和视觉的踪迹作为可以相互认知的符号网络”^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求从史学与美学相结合的高度来评判文学，也具有一种明确的历史诗学取向。

理论家自觉建立“历史诗学”学科的构想，是从19世纪末期开始的。当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维谢洛夫斯基明确提出要建立一种“历史诗学”批评体系，指出它将清除文学史的各种思辨理论，从诗歌的历史中阐明它的本质；其任务是“从诗歌的历史演变中抽象出诗歌创作的规律和评价它的各种现象的标准——以取代至今占统治地位的抽象定义和片面的假定的判决”^②。同时由原先从诗歌历史发展中阐明其历史本质的研究，转向研究文学艺术本身的规律，即以历史为参照来研究文学艺术本身的规律，缘此而建立一种诗学理论体系。巴赫金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长文《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论》重申了“历史诗学”问题，认为“文学把握现实的历史时间和空间，把握现在时空中的现实的历史的人——这个过程是十分复杂、若断若续的。”^③按其理解，对这个过程的研究就是“历史诗学”（但其时直至60年代，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诗学居于统治地位，历史诗学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冷遇。该文收入其论文集《文学与美学问题》直至1975年才在莫斯科首次发表）。60年代，在苏联曾出现了一个历史诗学研究的小高潮，巴赫金从历史诗学角度探讨了拉伯雷的艺术创作并修订再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学术界涌现出研究“神话诗学”、“民间创作诗学”等诗学问题的专著。在这一时期，历史诗学在苏联逐渐形成为一

^① Gallagher, C. & Greenblatt, S. *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 p.6,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58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巴赫金：《小说理论》，24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个学术流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赫拉普钦科院士宣布要将历史诗学作为一门“新学科”来建设，认为“历史诗学的内容和对象可以规定为：研究形象地掌握世界的方法和手段的演变，这些方法和手段的社会功能的发挥，研究各种艺术发现的命运”。^① 进入 90 年代以后，历史诗学在俄罗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有大量相关专著和论文问世，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文学研究所将历史诗学确定为未来最主要、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之一。其研究也显示出了一些新特点：由对具体作家的研究转向文学体裁演变的宏观研究；借鉴当代人文学科研究的新方法如语言分析等，但仍注意从历史和社会变化的背景中去考察；破除了历史与文学间的“因果关系”，而代之以“复杂的多向联系”等。^② 总的看来，俄罗斯批评家所提倡的历史诗学，旨在以历史和史学为参照而构设文学理论，属于以历史为原则方法的文学理论。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元历史：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一书中将“历史诗学”作为该书“导言”的副题 (Introduction: The Poetics of History)，全面论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传统观念认为，“历史学家‘发现’他的故事，而小说家则‘发明’他的故事”。^③ 然而，这一观念“隐瞒了‘创造’在历史学家的作业里也有所参与的程度”，认为历史修撰过程中“情节编排”、“论证解释”和“意识形态含义”等“创造性”环节不可避免，因此“历史”在本质上是“诗学的”。^④ 后来，他在论文《评新历史主义》(1989)里认为，新历史主义提出了“文化诗

① 赫拉普钦科：《赫拉普钦科论文集》，40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②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267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③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375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④ 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三辑，356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